

山河

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

国运

叶曙明
著



山河 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国运

叶曙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河国运：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 / 叶曙明著. —

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4.8

ISBN 978-7-5108-3213-0

I. ①山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近代史—研究 IV. ①K25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2503号

山河国运：近代中国的地方博弈

作 者 叶曙明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
印 张 21
字 数 300千字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3213-0
定 价 45.00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从大历史回望近代中国

马 勇

很久以来，总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国的政治选择，以为几乎所有关键时刻中国人都作了不太正确的选择：洋务新政没有结果选择了维新，维新没有结果选择了宪政，宪政没有结果选择了共和，共和没有结果重选了帝制……分析过往一百多年，中国人几乎将世界上所有主义尝试了一遍。

现实的中国，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。历史的中国，似乎并不如此简单。每一次历史选择并不一定是历史必然，但其内在的历史逻辑一定还会或隐或显呈现。

中国从农业文明认同并走向工业文明，用了很长时间，19世纪60年代开启的中国现代化运动，不管怎样评估，那都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：一个与传统不一样的中国由此开始，“四民社会”渐渐解体，一个全新的社会结构，一个全新的生存方式，均由此发生。

洋务新政自以为聪明地将“体用”分为两概，以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“后发优势”，模仿西方现代化。洋务新政确实将“后发优势”发挥到了极致，中国在三十年左右，在工业化、现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羡的成绩。

但是，“后发优势”又是“后发劣势”。后发国家在利用后发模仿先发的時候，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，不注意制度跟进，那么所有的模仿不是导致后发国家的制度创造，而是为落后的制度背书，证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动工业化、现代化的模仿。于是，中国在洋务新政几十年的进步，在遇到同样的后发国家日本时，却不堪一击，立即打回了原形。

甲午战败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新起点，从那之后至1928年北洋政府结束，应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时期，其思想的自由，制度的模仿创造，现代文明的兴起与发展，都是中国1860年走向现代之后最健康的一段时期，仿佛百家争鸣在现代中国的重现。

但是，正如一切民主体制缺乏效率一样，1895年之后的维新、新政、宪政，直至共和，确实在效率上无法让人满意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，中国竟然在关涉自身利益的参战问题上长期争执，久议不决，生生错过了参战的最佳时机，极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。

而且，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病，科学技术的发展既造福于人类，也是残杀同类的利器。一直引领中国学习西方的梁启超到西方看了一圈，深度怀疑资本主义对中国未来的意义。中国在学习西方六十年之后，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

假如不发生山东问题，或者说中国的山东权益能够在巴黎和会收回，中国人对于公理战胜强权应该不会失去信心。无奈，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不仅效率低下，而且见识太短，在对外交涉上留下了许多硬伤。巴黎和会没有让中国人如愿，中国人也就对公理渐渐失去信任。

恰当此时，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向中国抛出橄榄枝，而且苏联新体制在列宁“新经济政策”主导下，确实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样的魔力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活力在新经济体制下获得了充分发展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糅合了社会主义、资本主义的优点，这是当年一度让中国人神往的原因之一。

列宁、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发展，相当一

部分中国人并不一定认同苏维埃体制，但对列宁抛给中国的橄榄枝，对列宁构建的政党、政体的纪律、效率印象深刻。而那时的苏联，延续马克思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传统，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广普世价值一样，狂热地推广共产主义。中国处在十字路口，共产主义就在这个时候进入中国，并从一种理论上的研讨进入实际的政治运动。

共产主义进入中国和亚洲以后，特别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实践中的政治运动进入之后，“反赤化运动”在中国在亚洲一度崛起。但是，稍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幸发生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。社会主义苏联由于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制度，一枝独秀，这也是中国急剧“北向”的一个因素。1931年11月7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，这标志着中国转向苏联已由一种可能变为现实。

由此反观近代中国在十字路口的选择，应该看到这都是中国人面对现实所作出的最具功利的思考。李泽厚对中国文明有一个“实用理性”的评估。如果用这个观点回望明代中期以来，中国面对西方所作出的每一个重要选择，我们都能感到中国人常常是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。

系统讨论近代中国政治选择当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，这一点感想只是在拜读了叶曙明先生的新著《山河国运》之后的一点感想，写出来以供叶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评指教。

目 录

引言：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/1

南方卷

异端与革命

第一章 反抗大清：一场民族革命

- 一、洪秀全与曾国藩：南方的崛起/6
- 二、依靠会党的反抗运动/14
- 三、会党革命，能创造美好的世界吗？/25

第二章 反抗北洋：脏水与孩子一起倒掉

- 一、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对不对？/35
- 二、重蹈秘密帮会的老路/46
- 三、南方联治运动的兴与败/56

第三章 赢了军事 输了政治

- 一、向北方伸出橄榄枝/69
- 二、与商人决裂：意味着放弃南方/78
- 三、南方革命的退潮/87

北方卷

斩不断的龙脉

第四章 帝都面孔：凝固与阴沉

- 一、北方草莽与官僚/106
- 二、恢复帝制的死胡同/121
- 三、北洋实业的台前幕后/128

第五章 还政于清 输得更惨

- 一、参战问题：北方乱象纷呈/138
- 二、帝国的叫魂：1917年7月1日/145
- 三、再造共和，还是赝品/149

第六章 民族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标本

- 一、吴佩孚：是华盛顿还是岳武穆/157
- 二、没完没了的战乱/167
- 三、内圣外王幻觉的破灭/171

第七章 土围子里的皇帝们

- 一、与文明的时差/182
- 二、阎锡山：山西土老财/189
- 三、冯玉祥：大闹天宫的农民/195

第八章 逆淘汰：西北的介入

- 一、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/202
- 二、曹锟贿选：北洋溃败的关键/207
- 三、成则问鼎中原，败则退回西北/222

第九章 南北相争中的“渔翁”

- 一、西北农夫如何谋取利益最大化/228
- 二、南方、西北和东部鼎足而立/233
- 三、东部击退了西南/237

第十章 夹缝中的奋斗

- 一、东部帮会的特点/246
- 二、农民大联合：西北与西南合作反蒋/259
- 三、更广泛的农民革命起来了/268

第十一章 儒家与基督

- 一、在国际上试图强硬起来/279
- 二、白山黑水的沦丧/284
- 三、轮到上海：东部财团的崩坍/289

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

- 一、一个低效政府的艰难运作/298
- 二、以空间换时间：东部的空间换没了/305
- 三、又回到了西北原点/314

结束语：历史的余音/322

地域文化决定中国历史

如果人们有机会在中国作一次穿越南北、横贯东西的旅行，他们将会发现，在这四个方位之间，居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。

以地理环境而言，东南方平畴千里，水赋山春，河流如网，湖泊如星。天气受东南方低纬度的太平洋气候影响，温暖潮湿，雨量充足，在沿海地区有大量的冲积土，土质肥沃，人口稠密。中国的西北方则受高纬度的北亚气候影响，即使在夏季，海洋性的夏季风也不易进入，而西风气流则非常强盛，空气干燥，冬天气温寒冷，春天风沙弥漫。

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，不会无缘无故，都有其内在的逻辑，地理气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由于地理气候不同，主要的粮食也不同，南方以水稻为主，北方以小麦为主，水稻与小麦的种植区，大致以长江为分隔线。粮食构成的差异，一个吃米，一个吃面，也是形成南北民俗和民风各异的原因之一。

海洋文明兴起之前，中国在近两三千年来，经历过黄河文化、长江文化两个伟大的文明时代。黄河文化从西周走到秦、汉，趋于饱和，然后走下坡路；唐、宋时代，长江文化崛起，走到北宋晚期，达至顶峰，然后又趋于饱和，经蒙元的摧残，渐走下坡路，文化与经济的重心，继续南移。有人说“崖山之后无中国”，便是看到中国文化已移到了南海之滨，前面是茫茫大海，再无处可移了，唯有与南宋偕亡。

北方从来不认为南方有资格承载中国的正统文化。站在黄河文化时代的中原角度去看，愈往南行，则离文明愈远，五岭以南是全中国最边远的蛮瘴地区，那里只有“短发纹身、口吐鸟语”的野蛮人。但如果站在海洋文明的角度去看，情形则恰恰相反，愈往南行，离世界愈近，翻过了五岭，拥有四千多公里海岸线的广东，是中国与世界相接的最前沿。到明、清时，随着世界海洋文明的兴起，中国的文化重心，移至珠江流域，而形成第三个文化高峰——珠江文化。

当欧美现代文明东渐之际，这里无疑会得风气之先。而西北方地处亚陆腹地，受层峦叠嶂之阻，交通不便，资讯贫乏，外部世界的影响，到达这里已经微乎其微。这种泾渭分明的地理结构和文化迁移路线，对南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海洋从来是南方人托命之所，所以他们对海洋有着本能的依赖，而对长江以北，则抱有天然的警觉。文化心理上的原因，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、汉时代。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征讨岭南，这五十万大军，是由北方的罪吏、逃亡人、赘婿、三代之内有商人户籍的贱民组成。他们在平定岭南之后，马上掉转枪头，烧绝栈道，自立为国，与北方为敌。

尽管汉武帝最终平定了南越国，但朝廷依然把岭南作为流放罪犯和谪臣的地方。这是造成南北在政治上长期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在南方人眼里，凡从长江以北打过来的，无论是秦始皇的五十万大军，还是汉武帝的金戈铁马、抑或蒙元铁蹄、满清八旗，都是在破坏他们的家园，留下的都是惨痛的战乱记忆。

历史学家在谈论岭南人的家世时，常说他们都是中原迁徙而来的，似乎以此证明南蛮子其实与“河南世泽，渭水家声”是一脉相通的，出自同一个文化体。但却往往忽略了一点，这些从中原迁徙而来的人，几乎没有谁是自愿的，不是被朝廷贬谪、发配，就是因战乱而逃出家園，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：人人心境都是阴郁的、悲凉的、怨忿的。

纵观历史，每当北方进入周期性天下大乱之际，如两晋五胡十六国、安史之乱、残唐五代、北宋末、南宋末、明末，就有大批北方士民

逃难到南方。这些人既有对北方宫庙城社的缅怀，更有家破人亡留下的悲惨记忆。岭南人重视“营宫室，必先祠堂，明宗法，继绝嗣，重祀田”，虽然不无对北方故土的追思之意，但亦有对宗族血脉在南方得以传承与兴旺的期望，背后隐隐透出一种“你要我死，我偏不死”的倔强心理动机。

在南方的民间传说里，可以找到大量先人在北方被残害、追杀、驱逐，流落到南方的记录，对南迁的记忆，绝不是愉快的。南方许多地方都有捡骨再葬的风俗，即把死者先用棺入葬，等肉身腐化以后，再开棺检出骸骨洗净，入埋安葬。改葬之俗，岭南地区甚盛。有些地方，还会葬完再葬，屡经起迁，遗骸残蚀，仅余数片，仍转徙不已。这种习俗，便是源于中原人背负先人遗骸，辗转万里南下的经历。

北方对他们来说，又爱又恨，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，纠缠着十分复杂的感情。试想，这么多心怀怨望的人，背着祖先遗骸，汇聚到南方，通过宗牒族谱与口耳相传，对北方的“选择性记忆”自然根深蒂固，成为南方的文化基因之一。他们虽然知道自己身上可能会有“河南世泽”的血统，但更愿意强调自己是南方人，不是北方人。

经过千百年的沉积，形成了南方人倔强、坚忍、充满生命力、具有叛逆精神、敢为天下先的性格。宋、明末年，游牧大军在北方纵横驰骋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但在南方，却遇到最顽强的抵抗。南宋、南明最后都灭于广东，这不是偶然的，南方人不肯做顺民，不肯向外族屈服的性格，往往成为文化命脉存亡绝续的最后防线。

南方的文化也是自出机杼，成一家风骨。南方人有一种不肯认命的性格，对命运有一种天然的反抗，他们把自身的反叛性带到了南方，很自然地，他们所信奉的“异端邪说”也在南方传播和滋长开来，一旦从海洋吸取到外来的养分，马上会膨胀发酵起来，直接挑战北方正统。这种情形，已被太平天国、同盟会革命、国民革命等一系列由南方发动的政治运动所一再印证。

然而，当我们在审视南北文化的时候，不可忘了，中国幅员辽阔，

除南北之外，还有东西文化的区别。东部文化以江苏、浙江为代表，西部文化以陕西、甘肃为代表。东部带有鲜明的长江文化特征，而西部则更多是黄河文化的特征。上海是一个值得好好发掘、认真研究的地方，它和广东一样背靠海洋，但夹在南北之间，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血脉里，混合着南北与海洋的各种基因，它既不像南方人那么倔强、独立，也不像北方人那么高傲、大气。它灵活、圆通、善变，无论是北洋当政，还是国民党当政，都能够左右逢源，处理得恰到好处。这是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典型标本。

南北文化的差异，造成相互间的歧视和排斥，南方人看不起北方人，北方人也看不起南方人，北方整天高喊“南征”，南方也整天高喊“北伐”，一个要“武力统一南方”，一个要“饮马长江，扫荡黄河”。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北大决战中，东部地区时而支持南方，时而支持北方，最终倒向南方，成就了国民革命的北伐胜利。正当东部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，九一八事变爆发，日本入侵东北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：淞沪抗战，国民政府迁往洛阳，西安事变，有如急风骤雨，令中国整个政治地理格局，突然间完全改观了。

东部这颗明星一夜陨落，而西部则像太阳从黄土高原的背后升起，河汉倒流，天地翻覆，那一年，决定了中国的未来。

南方卷

异端与革命

第一章

反抗大清：一场民族革命

一、洪秀全与曾国藩：南方的崛起

广东，对于近代中国来说，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名字。中国自秦汉以降，江山定于一尊，“君临天下，统驭万方”，四夷皆为化外之民。然鸦片战争后，“未经开化”的南方，却突然平地崛起，以乘风振奋出六合之势，十数年间，便登上了舞台的中心位置，其崛起之速，影响之大，令天下为之瞠目，历史为之震惊。

两千多年来，究竟谁是中国的统治者？这是一个疑问。虽说“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天下君”，但庞大臃肿的官僚体制，并不能完全控制得到广土众民的社会基层。朝廷权力只到达县一级，下面存在大片的断层，是官府鞭长莫及的，必须运用父权、夫权、绅权、神权等，以及依靠大批豪强、吏役，来填补空白。

农村的实际情况是，绅权往往比治权强大得多，祠堂的作用比衙门大得多。农村的祠堂起着维系宗族的作用，补政权之不足。“中国家族之稳固，恒视其全族势力之大小与人丁之多少为衡。”对农村生活深有了解的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曾说：“中国村乡隔县城或最近之官衙有远至六七十里路者；每有讼事发生，官吏胥役，重重剥削，所费不貲；故乡人遇有争执，恒由族中父老判断是非曲直，甚或与邻村邻族械斗以武力解决。”[参见：洪仁玕述，韩山文著《太平天国起义记》。《太平天国》（六）。

上海人民出版社、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年版。]当小姓、小族受到大姓、大族欺压时，如果不联合起来，就无法与之抗衡，亦无法生存。因此，异姓结拜，互助互济，攻守同盟，成为宗族争斗中常用的手段。

这种结盟，便是秘密会社的最早形式。

自古以来，庙堂与江湖是支配着中国社会的两大系统。从文化而言，一为“儒”，一为“侠”，在历朝历代治乱相替的循环中，起着相生相克的作用，缺一不可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有两类人备受尊崇，一为圣君、贤相、儒将、忠臣、清官，这是庙堂系统的；一为高僧、隐逸、侠士、豪客，这是江湖系统的。

以忠诚孝悌、仁义礼智为其核心价值观的江湖英雄，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，亦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。及至后世，追随者日众，遂慢慢演变成一种秘密会社组织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刘、关、张，《水浒传》里的忠义堂，成为他们热衷模仿的对象。

这些江湖秘密组织，大致分成两类，一为会党，一为教门。迨至清嘉、道年间，福建、江西、两广、湖南、贵州、云南、河南遍地皆然，计有天地会、添弟会、三合会、三点会、仁义会、双刀会、百子会、洪莲会、老瓜（卦子）、嘬噜、青帮、小刀会、牛头会、收元教、黄天道、罗教、天理教、弘阳教、清茶门之类的教门，不一而足，实繁有徒。

中国的秘密会社，在近代一系列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中，扮演着非常特殊的重要角色，它们拥有巨大的能量，即使在朝廷的高压政策之下，仍能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，各个阶层。招徒聚众，歃血盟誓，焚表结拜，请菩萨的请菩萨，拜弥勒的拜弥勒。帮规戒律多如牛毛，连普通人家的兄弟不睦、妇姑勃谿、床第之私，也要管上一管。别说官府，就连祠堂，也没它管得深入细致。

在历史上，一般的秘密会社，虽有民间正义维护者的一面，然流弊亦甚大。每当历朝衰乱之秋、亡国之际，或遇着天灾人祸的时候，这些